

为了历史教育学的明天

赵亚夫¹口述 陈德运²、马玲玉³采访整理

(1.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2.3.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048)

[摘要]从历史教授法到历史教学法,再由历史教学法到历史教育学,学界经历了百年时间。虽然至今对其研究的外延和内涵仍没有形成共识,但是其进步有目共睹。伴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愈来愈棘手,教育理论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愈来愈复杂。时代迫使历史教育工作者厘清概念、明确方向,以便历史教育研究有更实质性的进步。

[关键词]历史教授法 历史教学法 历史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8-0064-05

一、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话题

■赵亚夫 ●陈德运、马玲玉

●赵老师,您好!在我们的专业学习中,常常遇到概念混乱的问题。其中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我们的研究领域的属性和学科研究方向的性质。即便国家学科目录标明是“课程与教学论”,可涉及研究方向时,有的学校要求是历史教育学,有的学校认定是历史课程与教学论,还有的写历史教学论或历史教学法。看学者们的著作,同样较乱,学科教学法与学科教学论、学科教育学,在内容上交叉很多,并没有明确区分。在实践中,多数教师依然坚守教学法,包括一些研究者连课程与教学论也排斥。我们对这样的现象很困惑。

■这是一个既现实又尖锐的问题。一方面,历史教育、教学研究早已进入了“学术期”,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缺乏学术自觉,导致学术教育系统乃至基本概念都是混乱的。一句话,因为历史教育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自信和能力,建立一门独立的历史教育学,所以我们不是重复别人的话,就是走别人为我们划定的路。有趣的是,我们似乎又不太情愿这样做。

另一方面,历史教育、教学的理论研究长期与历史教育、教学的实践研究相脱节,导致理论成为灰色地带。事实上,历史教学中的一切现实问题,

深究的话,都是理论与理论相关的问题,可是大家却认为皆与理论无关。结果是,我们制定课程标准,一大堆的“现实”问题摆在那里需要理论解决,我们很少有理论意识且从理论方面解决它们,只能用经验的办法,教材怎么编,才适宜学生发展历史意识,依然需要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编教材”这门学问要求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并不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可以编好教材的;教学中的理论更多,什么是有效教学,有个有效教学理论做指导。如果我们认为这些都没有用,那什么有用呢?升学考试指导,抓分数总是我们说的有用的“现实”吧。可是,成绩就是上不去!运用题海战术、压题战略,到军事化管理,“抓高考抓出了血”又如何呢?因为没有理论在其中,我们只有全民下苦海,异化了学科,异化了学生,也异化了我们自己。

●过去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上不好课,多是认为教学法水平不够。有了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后,又认为读书不多。可是,教学法学了,仍解决不了大问题,书读了,似乎更迷惑。在您看来是理论跟不上,甚至说是因为没有理论。可是,一般的看法,还是理论没有用。

■历史教学研究的问题就在这里。你没有研究,怎么知道理论是什么?你没有用理论指导实践,怎么知道理论有用没有用?今天,你们提出的困惑问题,躲不开还是个理论问题——明白一个学科的“源”和“流”的问题,十分重要。

【收稿日期】2013-02-11

二、从历史教授法到历史教学法： 为什么教历史

●先提第一个问题，历史教授法和历史教学法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区分是，教授法是单边教学法，教学法是双边教学？

■这个看法简洁、实用。但是，在学术领域，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看到“教授法”，就以为都是讲教师如何教的办法，“教学法”都比“教授法”进步。其实，严肃的教授法，有水平的教授法，很有学术含量，不都是“教材的教法”。我看1904年《教育世界》上连载的《历史教授法》（罗振玉、王国维主编），以及1906年夏清贻的《历史教授法》就没有强烈的“窄”的感觉。要知道，我们既从美国输入历史教授法，也从苏联输入历史教授法，这两个系统很不一样。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们的教授法观念源于苏联，反而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授法知之甚少。历史教授法以教材为中心、以讲授为中心，我们把它看成是天经地义的戒条，是受苏联的影响。历史只能讲授，而且只能依照教科书教授，则是对苏式教授法极端化。

●那么，我们说的“教材教法”，是不是等同于教授法呢？

■我看是这样。无疑，教授法的研究对象是教材，宽一些的还强调教师的教法。但是，作为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因教材在学校教育中的特殊地位——教学活动中介，它也可能只规范教师的教法，同时也会规范学生的学法。所以，有些教授法、尤其是定格在教授法的作品中，也有比“教材教法”宽泛的情况。然而，教授法与教学法的重要区别，还是在研究对象上，教授法以研究教材（等于教科书）为研究对象。

●教授法以教材为中心，有它的必然性吗？从学术史的角度上该如何看？

■教授法是近代社会的产物，是我们理应珍视的教学研究遗产。还有，教学法的产生不是都比教授法为晚。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任钟印译），在1939年首次出版时被译为《大教授学》（傅任敢译），比较二者的序言意味深长。我们不去讨论哪个译名更准确，也不涉及时代要求，仅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回答你们的问题：其一，教授法或教授学也是学校教育专门化的产物；其二，教科书中心主义的教授法或教授学，与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关。

也就是说，学校教育水准越高，相应的教师的专业化要求也越高，教授法的功能反而越差；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相应的学生的个性化要求越高，教授法的作用反而越低。现在，为什么我们已经舍弃不了教授法不用，但现实中还有那么多的根深蒂固的教授法观念存在，原因也在学校教育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

●所以，我们还处在教授法和教学法并生的时代。这样的话，“好课都是讲出来的”，“课本，课本，一课之本”等观点，都是合理吧。

■我是这样看的。用教授法规范教师的教学行为，以保证起码的教学水平，比信马由缰的教学，对学生更负责任。不过话又说回来，毕竟教授法不是教学法，如陶行知从杜威那里传来的教学法。教学法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真正发生作用的，它开始关注学生的差异和个性，强调尊重学生，并以心理学作为教学的研究基础。

●说教学法比教授法进步，关键是看，是不是关注“教”与“学”两方面，是不是把学生的学习放在了应有的位置。或者说，研究“教”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学”。

■这个概括很好。教授法是教学法的一部分，尽管在具体的研究内容方面，教授法与教学法有不交叉的时候，但是它同样服务于学校教育的专门化，以及教师职业的专业化。1926年，何炳松把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引进来，学者中不少人还是称之为教授法（包括何氏本人），就有这个背景。我们对“Teaching”这个词的接受和理解，也不是一开始就到位的。以到今天有学者介绍何炳松的作品，还没有完全脱去这一影响。

●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现象。其实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有很鲜明的时代性，而且以当时流行的鲁滨逊的“新史学”为基础，涉及内容很宽，让人感到教学法也真的可称为“教学学”。

■是这样。我国学者的教学法著作，也有同样的特点，如郑鹤声的《中学历史教学法》，胡哲敷的《历史教学法》。总体说来，20世纪前半期，教授法是研究主流，教授法和教学法在概念上常常混用。这个现象，一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有所变化。为什么要混用呢？究其原因，最为重要的有两条：学科教育与社会政治捆绑的过紧，由政治意志和社会义务导向的教学研究，偏于教什么和怎样教是自然的事；随着义务教育的发展，学校范围的扩大，历史教师岗位增加甚快，但可补充的合格人员

有限。为了应付开课和保证基本的教学质量,教授法以及侧重于教授法的教学法,也更容易产生实际的效果。当然,历史教学研究本身的难度、师范院校的学科定位等,都倾向教授法研究。

●您说侧重于教授法的教学法是什么意思?

■即标明教学法的作品,实际讲的是教授法。我视其为对教学法所做的某个侧面的研究。反过来,也有侧重于教学法教授法研究。比如,蒋梦麟的《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1918),就基于教授谈教育本真;陆光宇的《历史教授法革新论》(1919)和陈安仁的《历史教授法之意义与目的》(1946),实际讲的是教学法的意义与目的。而徐则陵口述的《历史教学法》(1921),以及梁绳筠的《历史的研究法和教学法》(1923),却是典型的教授法。

●50年代以后,教育领域一边倒向苏联,对我国高师历史教学研究有深远影响,这个影响该怎么看?特别是它对现有的历史教育研究乃至未来发展有什么影响?

■我有两个基本判断:积重难返,洗心革面。今年我们在《中史参》上发了个《历史教育研究著述提要》,对60年来重要作品做了整理,只要研究者用点时间读读相关作品,就清楚了我们的研究状况。如果研究者再把民国时期的相关作品拿来比较,便能够深刻地知道积重难返的含义。简单地说,苏联经验让我们的历史教学已微缩到教材本身,使历史教学失去了基本的学科视野。现在没有谁还说我要用苏联的办法教,可事实上—面对实际教学就自然地用那一套。大学教学法尽管渗透了不少新意识,运用了不少新观念,但一落实实用性就是普希金那般经验。研究教学等同于研究教法,研究教法等同于研究教材,关注效益等于研究考试。

今天的教育改革,依然针对苏式教授法的影响。特别是高师院校的相关课程,在形式上接受了不少的西方的东西,但骨子里还是苏联的教学法模子。它对当下和未来历史教育研究的影响,一是限制教师发展理论意识,二是阻碍教师发展研究能力,三是“窄化”和“稚化”研究内容。

●我们看教学法著作,从管昕石编的《中学历史教学法》(1957)到最近出版的教学法,的确觉得内容变化较大,但理论突破不大,尤其不能真正解决教学难题。

■因为教学法本身就不是理论研究。依赖教

学法不能形成独立的历史教育、教学研究体系。历史教育、教学研究没有理论,不能在学术上形成独立学问,历史教育、教学的深层次问题就不能解决。

●可是在很多人看来,我们根本不需要理论。教好历史,关键在涵养教师的史学素养,这是最高的标准;面对一般教师,则只需要用好教材,帮助学生有能力考到好成绩。还有,您提到的历史教育中的人格教育、公民教育,教师们虽然觉得对,但一样感到不实际。

■没有理论,即便教学法,也只能依赖政治环境生存,有怎样的政治主导,就有怎样的教学法性格。历史教育、教学不能因理论而形成独立的学科学问系统,其学术生态随波逐流。当特定的政治环境变化了,它就成了弃婴,你还指望它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这希望那发展吗?

●能不能这样看,历史教学研究的学术化、理论化,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必须的。政治社会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经济多样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科学技术在运用领域的高度个性化,都已深深影响着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趋势。我们看到的眼前的“现实”,未必是真实的。就如同晚清,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看到的现实,与之前顽固坚持的现实,很不一样。后者的现实是死亡的现实,前者的现实是活生生的现实。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看这活生生的现实,有没有能力去看、去掌握这活生生的现实。为此,你们去读一读以下几本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教育的使命》《学会生存》《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科社,1996);《大趋势:形塑教育》(华东师大出版社,2009);《数字化成长》(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它们会从不同角度,告诉你们该思考哪些重要的历史教育问题。

三、从历史教学法到历史教育学: 放宽学科视野

●1987年,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安徽泾县召开学术讨论会,朱志明、沈敬华提交了《论议历史教育学的建立》(《历史教学》,1988年第3期)的论文,率先做了尝试性研究。1989年,赵恒烈和王铎全的《历史教育学》先后问世,是不是标志着“历史教学法”已发展到“历史教育学”阶段。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起点。其实,将学科教

学法提升到学科教育学,最早是由北师大(现首师大)院长仓孝和提出的。初衷就是由学科教育学代替学科的教材教法,有两个基本的立脚点:突出师范性和我校的办学特色;使学科教学研究转向学科教育研究,开辟学术化的学科教育之路。1986年底,北师大成立了我国高师院校第一个学科教育学研究中心。1988年,出版《学科教育学初探》一书。周发增、于友西、赵恒烈诸先生,是历史教育学的第一批建构者。

与学科教学法相比,学科教育学试图从教育的视野拓展研究课题。以至后来有学者把家庭历史教育、社会历史教育都引进来。就目前而言,区别是否是一部学科教育学著作也比较简单。一是看它所研究的问题,是教育层面的问题还是教学层面的问题,比较集中地讨论课堂教学的作品,不是;二是看它是否具有理论性质或具有鲜明的理论基础,包括学科教育的价值取向,过于倾向操作性的作品,不是;三是看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否具有系统性,过于零碎且非系统的研究,不是。

●我们看到,有关学科的教授法和教学法的区别,大家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到了学科的教学法和教育学就混乱得多。有教学法、教学论、教育学多种称呼,有学者试图要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可我们看后,不是清楚了而是更糊涂了。所以,有学者戏称它们是“豆腐一碗,一碗豆腐”。

■很形象的比喻,说明我们的学术研究不到位。另一个方面,教育理论界也是多元态势,不同的教育理论流派必然影响学科教育研究分出不同观点。更何况,因为学科教育学还不具有学术上的独立性,只能消费别人的教学理论。但是,教育和教学毕竟也不是一个层次上的研究课题;教学论的“论”和教学法的“法”,同样如此。

简单地说,或许我们必须有这样一种研究意识,即历史教学法、历史教学论、历史教育学是三个递进提高的研究域。教学法是操作性研究,包括教材教法,它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教学技能,教学论即有理论性又有操作性,它所涵盖的教学法部分是操作性研究,而它的教学原理部分是理论性研究,历史教育学原则上包括所有的历史教育、教学研究,它理应是研究领域。包括,历史教育哲学理论、历史课程理论、历史教学理论、历史教材理论、历史学习理论、历史教师理论、历史评价理论、历史比较理论等。显然,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只是其中的课程、教学理论部分,作为二级学科放在

教育学一级学科下面有其合理性。历史教学论如果不是从课程论独立出来,它与课程与教学论则是一个概念,如果把教学论独立出来的话,它只是历史教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比课程与教学论还窄。至于教学法则更不能与历史教育学画等号。

●按照我国的学位规定,只有二级学科可以设博士点。也就是说,现有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点,是教育学一级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但是,按照您的主张,这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并没有达到历史教育学的水平。

■是的。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努力,不断完善历史教育学的研究体系。比如,今天的历史教育研究中,学科教育哲学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学科教育史的研究相当零碎,学科课程论的研究刚刚起步;学科教学的研究只能说有了部分基础;历史教材学的研究方有眉目;学科教学法的研究有待上层次,学科评价学的研究基本没有着落,等等。再比如,我们运用教育学理论不能彻底解决历史教育、教学问题,原有的历史教学经验、现有的历史研究成果,又很难完全在教育上发挥作用。所以,不是谁非要让历史教学研究理论化、学术化,而是时代要求我们、学生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冲破原有教学法的研究模式,建立独立的、属于自己的历史教育学。

四、历史教育学的发展前景:任重道远

●要建立您所说的历史教育学体系,恐怕不是短时间的事吧。根据您的看法,历史课程与教学论也是权宜之计,那么我们进步的方向在哪里?

■首先是改革,改革本身就是进步。改革中有什么缺点、错误,就是走了弯路,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抱残守缺,却认为自己都对。我们什么地方进步了,即要看事实本身,也要讲学术理据。不能迷信权威,更不能想当然。同样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是善意的,唯真理和学术的。

●您认为,我们是沿着历史教育学的路子走,还是继续走教学法或教学论的路子呢?

■答案是明确的,开辟历史教育学之路。因为,教学法的路走不通,教学论的路有限。现阶段,一下子铺开所有研究,有难度。我们强调的是,强化研究意识。无论你研究什么,有两个研究是必须的,理论的和实证的。没有理论,我们只在原地打转转,最好是在外延大小上做文章。比如,你说

这个课程标准好,那个课程标准不好,必须以理(论)服人。没有实证,我们就会不断重复非科学的东西,最多是将盲目变得有序些。比如,你强调课程、教学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可是你的理据,还是50年前教科书上东西,根本没有新的实证研究数据,让人们怎么信。总之,我们不能拿几条教科书上的原则,便放之四海而皆准。

●我们感到研究历史教学很难,历史的、教育的、心理的知识涉及特别多,如果再从历史教育的角度着眼,要学的东西就更多了,我们该怎么办?

■我1996年就在文章中谈过这个问题。一门学科在学术上越复杂,说明它越具有进步性、成熟度越高。由历史教授法到历史教育学,这是学科发展的结果。现在靠一人之力,建成一个完成的历史教育学不可能。我们进入了大合作时代,要依赖每个人的精细研究贯穿于整个研究体系。所以,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清晰地知道自己的研究方向的性质和在学术体系中的地位。为此,我们也找到今天这个讨论话题的必要性。

●只有合作才能产生高质量的成果,才能比较快地成熟这门学科的理论 and 实践研究吧。

■是的。目前,我们在资源和学力方面都有限,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更有限,需要多方开辟合作领域,并以宽容的心态对待研究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研究课题,以自由的精神

善待研究成果。

●国家有个教育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您认为,历史教育学的中长期规划的要点在哪里?

■上面列出的所有研究方面,都在长期规划之内。中期的规划重点,应该是历史教育哲学、历史课程理论和历史学习理论的建设。这些研究不能是功能主义的,更不能是内容主义的,而只能是价值主义的。对于历史教育学的本质而言,第一是研究学生,第二是研究学生,第三还是研究学生。对于历史教育学的内容而言,第一是视野,第二是视野,第三还是视野。

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你们提出了一个好问题。

●也谢谢您,解决了我们的困惑。为什么是历史教授法、历史教学法、历史教育学,以及我们的努力方向,已经清晰了。

【作者简介】赵亚夫,男,1959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教育研究。

陈德运,男,1986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历史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研究生。

马玲玉,女,1988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历史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上接第44页)

The Commercial Ecosystem around the Enemy-Occupied Period of Nanking:
Take the Fishing Company for Example(1936—1939)

Abstract: The Fishing Company which was founded in 1936 and broke in 1939 aiming at leasing Xuanwu Lake. It aimed at maximizing the income, but it failed into difficult because it had to handle conflict of interests with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including official organizations, other merchants, etc. After the normal commercial ecosystem was destroyed by Japanese, the Fishing Company washed up.

Key Words: the Fishing Company, Xuanwu Lake, Park Service, Enemy-Occupied of Nanking